考古 2011 年第 4 期 〇研究与探索

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长江中游 史前城址分类研究

裴安平

关键词: 长江中游 史前城址 群聚形态

KEYWORDS: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Prehistoric City Sites Settlement Pattern ABSTRACT: The prehistoric city sites discovere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o date showed three types of pattern: single settlements, double settlements and multiple settlements. The features, development routes and natures of these three types are all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organization patterns of the city sites and the settlements nearby them decided the natures of the settlement clusters centered by the city site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sites in various settlement cluster patterns brought about the reorganizing and reassembling of the prehistoric kinship societies, which is also the mainstream of the evolutions of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Finally, along with the developing of some city sites into territorial societies, the earliest

考古工作表明,长江中游已经发现的 15 座史前晚期城址(图一)不仅可以按面积大小分类,还可以根据城内同时期聚落的数量分为单聚落城址、双聚落城址、多聚落城址三种类型。判断城内有不同聚落存在的标准有三条:第一,城内共存相互独立的几个居住区;第二,这些居住区的面积都不小于当时当地一般普通聚落的面积;第三,这些居住区都拥有与普通聚落相似的构成要素,如房址、墓葬、灰坑、陶窑等生活生产设施。

civilized archaic states appeared.

一、单聚落城址的特点、 渊源与属性

由单个聚落占有并使用的城址就是单 聚落城址。目前可辨认 7 座, 分别是湖南澧 县城头山^[1]、鸡叫城^[2],湖北公安鸡鸣城^[3]、公安青河^[4]、天门笑城^[5]、龙嘴^[6]、黄陂张西湾^[7]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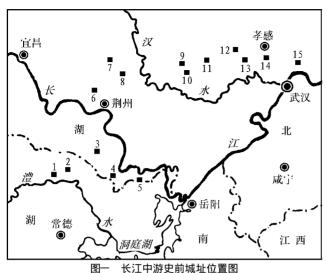
(一)城址的特点

- 1. 规模偏小。包括墙体在内,多数城址的面积都在 6~ 15万平方米。其中,湖北公安青河 6万平方米,龙嘴 8.2 万平方米,笑城 9.8 万平方米,张西湾 9.8 万平方米,湖南澧县城头山 14 万平方米,鸡叫城 15 万平方米,湖北公安鸡鸣城最大,18 万平方米。
- 2. 外观由圆形变为近方形。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址为圆形, 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及以后, 城址以近方形为主, 如湖南澧县鸡叫城, 湖北公安鸡鸣城、公安青河、天门笑城、龙嘴等。

作者: 裴安平, 南京市, 210097,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50(总 338)・

考 古



1. 城头山 2. 鸡叫城 3. 鸡鸣城 4. 青河 5. 走马岭 6. 阴湘城 7. 马家院 8. 城河 9. 石家河 10. 龙嘴 11. 笑城 12. 陶家湖 13. 门板湾 14. 叶家庙 15. 张西湾

3. 出现的时间早, 跨越的时代长, 数量多。这类城址不仅出现的时间最早, 而且跨越的时代也最长, 从大溪文化一直到石家河文化。其中, 时代最早的澧县城头山始筑于大溪文化早期, 最晚的黄陂张西湾始筑于石家河文化早期。至于数量, 这类城址也最多, 约占总数的 47%。

4. 城址内部为单聚落结构。以澧县城头山为例,城内的房址、制陶作坊、公共墓地等生产生活设施都明显具有单聚落的特点。这些设施不仅空间位置明确,长期固定不变,而且还是唯一的。其中,城的东、中、南部是大溪与屈家岭时期的制陶作坊,中部偏北是大溪晚期至石家河时期的公共墓地。

5. 晚期城址内外围圈大面积耕地。根据城址内外的有关设施与低洼地可知,大溪文化时期城内除了拥有大量的居住类生活设施以外,还有一定的手工业设施,但鲜见有农耕用地,澧县城头山即如此。但从屈家岭文化开始,几乎所有后起的城址都有圈地。多数是城内圈地,如湖北公安鸡鸣城。该城始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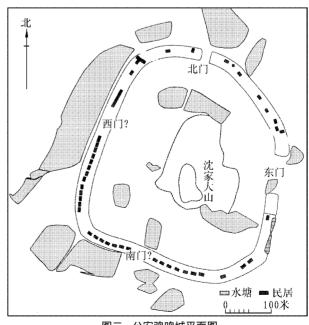
代不早于大溪中晚期, 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 但城内可供居住的高地仅有 4 万平方米, 城墙的基础占地约 5 万平方米, 减去上述二项占地面积, 可大体推知城内有地势低洼的农耕地约 7 万平方米, 是可居住面积的 1.75 倍 (图二)。

少数是城外圈地,如湖南澧县鸡叫城。该城始筑年代屈家岭中期,明显拥有三道城壕,每道城壕之间的距离都超过百米(图三)。由于外壕、中壕都只围圈了城址的一半或更小,故开挖它们的主要目的似乎不是扩大防御边界和强化防御功能,而是围圈农城 12 耕地备战备荒。依现在外壕长度,所圈土地是城内面积的 3 倍还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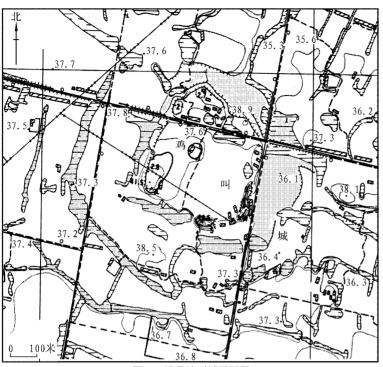
(二)城址的渊源

已有的资料显示单聚落城址的起源应 该是围沟单聚落和环壕单聚落。

早在距今8千年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围沟单聚落。由于这种聚落的围沟开口皆与聚落居住面等高、且随居住面的起伏而起伏.



图二 公安鸡鸣城平面图 (改自《古代文明》第 4卷)



图三 澧县鸡叫城平面图 (摘自澧县 1981 年万分之一地形图)

故与自然水源毫不相关,全部都是"干沟"。 这种沟还因规模较小,防御功能不甚明显, 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八十 聚落围沟即是 如此^[8]。

距今 6500 年, 伴随史前私有制的产生, 环壕聚落开始在围沟聚落的基础上出现。与围沟相比, 环壕最重要的特点是规模较大和有水沟, 沟的开口明显低于聚落居住面而接近自然水源, 沟内常年有水, 防御功能明显, 有的沟内侧还有低矮的土垣^[9]。 距今 6200年, 中国史前最早的城址在澧县城头山发现, 考古发掘证明它的前身就是一座汤家岗文化时期有土垣的环壕单聚落。

因此, 环壕单聚落应是单聚落城址的直接前身。

(三)城址属性的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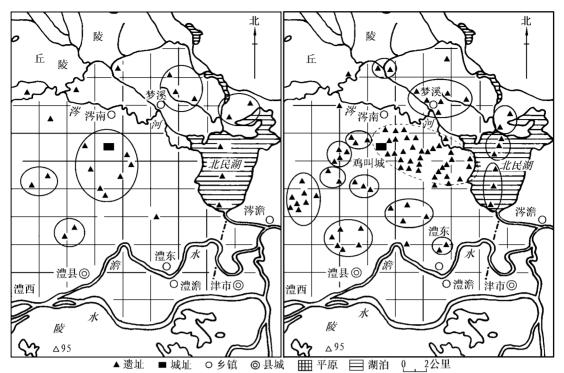
1. 就城内居民的社会关系而言, 单聚落城址可能是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所在地, 直接的血缘关系也是维系城址与聚落群其 他成员的主要纽带。

由干考古资料和现代 科技的局限, 目前尚不太 可能直接从这两个方面获 取城址属性的证据, 但国 内外的民族学资料却可提 供重要的线索和启发。一 般而言, 史前小型的聚落 群与氏族社会的部落存在 明显的对应关系、而部落 则往往是在氏族的基础上 通过自然的人口增殖与分 裂形成的。 马克思曾指出 "由于自然的增殖, 经常有 新的部落和氏族形成起 来": "如有几个村落沿着 一条河流彼此分布在不远 的地区内,则其居民通常 都是出自一个共同的血统 并结合在同一个部落或联

盟的组织之内"^[10]。显然,史前的聚落群应该就是氏族社会部落的一种物化形式,而其中的城址则可能是部落中时间较老、地位较高的母系或父系氏族所在地。

- 2. 就聚落群聚形态而言, 屈家岭文化 及以前所有的单聚落城址都是聚落群的核心, 而石家河时期个别城址则成为了聚落集 团, 甚至古国的核心。
- 一般而言,以单个聚落为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成的小型群体就是聚落群。调查发现,单聚落城址基本都是所在聚落群中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如澧县城头山在大溪文化时期就只与西边3个同时期聚落近距离相聚为群;屈家岭时期与其近距离相聚的聚落数量也没有大的变化。由于在这个群体中,城头山不仅时间最古老、面积最大,而且也是唯一的城址,故该聚落群的核心非它莫属

湖北公安鸡鸣城面积比城头山还大, 达 18万平方米, 但其所在聚落群规模很小, 目



图四 屈家岭与石家河时期鸡叫城及其周围的聚落分布图 (左:屈家岭时期,右:石家河时期)

前城外只见一个同期聚落。澧县鸡叫城在屈家岭时期的属性也与城头山、鸡鸣城一样,只是所在聚落群规模较大,一共有8个聚落(图四,左)。但石家河时期,其规模并未明显增大,但地位却连升了三级。

第一级,由聚落群的核心升为聚落群团的核心。聚落群团通常就是以聚落群为单位近距离相聚形成的聚落群聚形态。由图四(右)可知,石家河时期在鸡叫城东南约3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聚集了应该属于不同聚落群的36处聚落。在这些聚落中,鸡叫城不仅时间最古老,而且也是唯一的城址,所以它理应是这个群团的核心。

第二级,由聚落群团的核心升为聚落集团的核心。所谓聚落集团就是各种聚落组织,包括聚落群和聚落群团近距离聚集形成的大型聚落群聚形态,其核心往往是规模与实力最强的聚落群团。由图四(右)可见,石家河时期澧阳平原东部的全部聚落群体都已成为规模宏大的聚落集团的组织成员。其

中,鸡叫城及其所在聚落群团就是组织核心,而其他聚落群则近距离环绕在周边。

第三级,由聚落集团升级为古国都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澧阳平原上西距鸡叫城约 15 公里的城头山城址不仅崛起的时间早, 而且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还通过大规模的筑城显示了与鸡叫城对峙和较量的实力;但石家河时期城头山却明显衰落了,它不再修筑城墙,城内该时期的文化堆积也明显稀薄。这种状况不仅直接显示了它的衰落,更可能还意味着在战胜城头山之后,鸡叫城已成为了长江中游首批地缘文明古国的都城[11]。

二、双聚落城址的特点、 渊源与属性

由两个聚落共同占有并使用的城址就是双聚落城址。目前可辨认 5 座, 有湖北石首走马岭一屯子山^[12]、荆州阴湘城^[13]、应城陶家湖^[14]、应城门板湾^[15]、荆门马家院^[16]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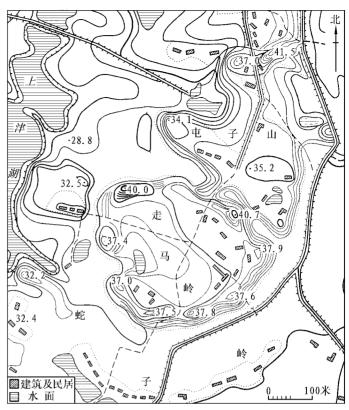
(一)城址的特点

- 1. 面积较大。包括城墙在内,多数城址的面积在 20~60 万平方米之间。其中,门板湾 20 万平方米,马家院 24 万平方米,走马岭一屯子山内城 16 万平方米,外城或超过 40 万平方米,阴湘城残存 20 万平方米,推测原有 35 万平方米,应城陶家湖 67 万平方米。
- 2. 大部分为近方形。除走马岭一屯子山为两个不规则圆形,其他都是近方形。
- 3. 出现时间略晚于单聚落城址。按筑城时间,走马岭一屯子山最早,为大溪晚期;阴湘城为屈家岭早中期;门板湾为屈家岭晚期;陶家湖、马家院皆为屈家岭时期。
- 4. 城址内部为双聚落结构。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 这类城址内 部聚落的分布位置有三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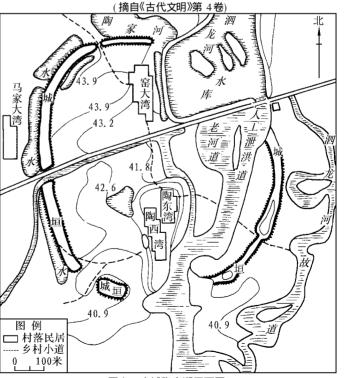
第一种是整个城址像是两个独立的聚落相互连接而成,石首走马岭一屯子山即是。走马岭与屯子山都是独立的聚落,分别位于相邻的低矮岗丘上,距离约50米;各自也有独立的城墙与城壕,城墙与城壕在相距最近处都有缺口方便往来(图五)。

第二种是两个聚落一南一北位于城内,中间有隔离区,如应城陶家湖、荆门马家院。陶家湖城内南北都有高地,但南部较大,面积约5万平方米,还有较多遗物及红烧土分布,估计应属城内的主要聚落(图六)。马家院城内主要聚落位于东北部的平岗上,面积约4万平方米,西南的平岗面积虽小,但地势较高,地表也有夯土遗迹。

第三种是两个聚落都位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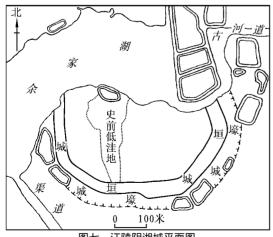
图五 石首走马岭—屯子山平面图



图六 应城陶家湖平面图 (摘自《文物》2001 年第 4 期)

内,但一东一西,中间也有隔离区,如湖北江陵阴湘城(图七)。该城东部和西部的地势都比较高,唯中间是一条南北向、宽约 50 米的低洼带。在东部高地上还发现大量的红烧土堆积,似为房屋遗迹较为集中处,堆积厚度在3米以上,遗存也十分丰富。在西部高地上也有类似的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厚度在2米以上,还发现有灰坑、灰沟和窑址等[17]。

5. 在城内或城外圈有大面积低洼农耕 地, 多为城内圈地。荆门马家院含城墙总面 积有 24 万平方米,城内可供居住的高地分 别位于东北和西南, 其中东北面积较大, 不 足 4 万平方米、南北二块高地相加不足 8 万 平方米, 剔除城墙与高地的面积后推测城内 耕地接近8万平方米,与城内居住区面积相 当。应城陶家湖包括城墙总面积有 67 万平 方米,由于城内南北二处居住用高地面积不 过 10 万平米。所以城内拥有的耕地面积当 数倍于居住高地。江陵阴湘城内东西高地之 间的低洼地既宽阔又有较多稻属植硅石发 现, 故考古发掘者当时就推测这里应属农耕 区[18]。还有少数城址在城外圈地, 如石首走 马岭一屯子山。在该城南部、内城外约150 米处,考古调查还发现了一道外城垣,当地 现称之为"蛇子岭"。虽然未将内城全部圈起 来, 但所圈之地皆为城址所在岗地下方的平 地, 故其意义当与澧县鸡叫城的二重外壕一



图七 江陵阴湘城平面图 (摘自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 69 册)

第 4 期

样, 都是保护耕地这条城址的生命线。

(二)城址的渊源

已有资料证明双聚落城址的渊源就是双聚落遗址。目前,这类遗址发现的数量越来越多,典型的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白音长汗^[19]、兴隆沟^[20]、赵宝沟遗址^[21],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唐户遗址,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早期遗址等。

值得注意的是, 兴隆洼文化的白音长 汗、兴降沟、赵宝沟三个遗址的聚落布局都 有共同点, 就是遗址内部两个聚落在外观看 既完全独立,又距离很近。白音长汗的两个 聚落尽管都是完全独立的围沟聚落,可两者 相距却不足 8米。兴隆沟、赵宝沟虽然都没 有聚落围沟,但两个聚落分别位于邻近山坡 的坡面上, 充分体现了各自的独立性。河南 新郑唐户遗址年代与兴隆洼文化比较接近, 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双聚落遗址[22]。遗址内 的两个聚落, 一个是围沟聚落, 房址都位于 围沟以内: 另一个则位于围沟以外, 属于普 通聚落。西安半坡遗址属仰韶文化早期, 年 代为距今6500年。考古证明该遗址内部有 两个聚落, 虽然它们外围使用同一条围沟, 但遗址中部的隔离沟还是将二者一南一北 分离得一清二楚[23]。

上述早期双聚落遗址虽然并不能直接证明为长江中游双聚落城址的渊源,但却都为认识长江中游类似的双聚落和寻找其渊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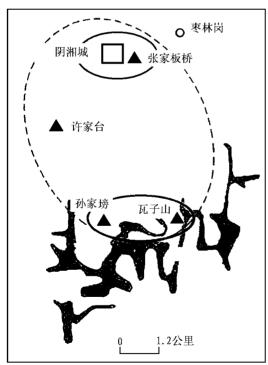
(三)城址的属性

1. 城内居民的社会关系。中外民族学的资料表明二合婚姻制很可能是双聚落城址存在的基本原因。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的两个外婚制半边称为胞族"^[24]。美洲印第安人"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25]。我国西南纳西族地区至今还有"望门居"的习俗,其基本意义也是基于"二合婚姻"派生的有关村寨近距离相聚的居住

方式^[26]。正因此,《白音长汗》编写者认为: "如果将生活在同一围沟内的人群看作是一个基本的血缘集团,要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则需要两个这样的集团密切合作。在氏族制度下,维系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主要有血亲和姻亲两种; 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又决定了两个互为婚姻的集团不可能相隔太远。像白音长汗这样结对双生的聚落形态,比照上述观点,可以说若合符契"^[27]。显然,在氏族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双聚落城址的社会属性应该就是一对相互通婚的胞族,同时也是规模最小的部落。

2. 聚落群聚形态的属性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城址本身就是一个小的聚落群。只发现石首走马岭一屯子山一例。之所以为小型聚落群,一方面因为城址的本身就是两个聚落近距离相聚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因为城址周边约 10 公里的范围内至今也没有发现其他同时期的聚落。因此,走马岭一



聚落群 (本) 聚落群团 圏八 阴湘城周边同期聚落分布图 (改自《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

屯子山现在只能定位为一个拥有两个聚落 的小型聚落群。

第二类,城址是所在聚落群或早期聚落群团的核心,多数双聚落城址都属于此类。荆州阴湘城首先就是所在聚落群的核心,因为城址东部不足1公里处还有1个同时期聚落。这就表明城内的两个聚落与城外的一个聚落同属一个聚落群,其中城址是这个聚落群的核心。阴湘城还是所在聚落群团的核心,因为在城址的周围还发现了至少2个同时期的聚落群。其中,南部的孙家与瓦子山是一群,二者相距仅约25公里;许家台虽然目前孤身独处,但周围应该曾经有过聚落群。阴湘城就是这些聚落群中唯一的城址,因此应当也就是由这几个聚落群聚成的聚落群团的核心(图八)。

三、多聚落城址的特点、 渊源与属性

由三个及以上聚落共同占有并使用的城址即为多聚落城址。目前可辨认 2座, 有湖北荆门后港城河^[29]和天门石家河^[30]。

(一)城址的特点

1. 数量少,面积大,时代晚。比较而言,这类城址的数量最少,只占各类城址总数的13%。出现的时间也晚,全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产物。但这类城址面积最大,单聚落城址平均11.54万平方米,双聚落城址平均32.4万平方米,多聚落城址则平均95万平方米,三者规模的比例是1:2.8:8.23。

2. 多聚落加大量低洼农耕地是基本布局模式。据调查,荆门城河城内面积 50 万平方米,东、北、南分布有三处高地。天门石家河城内可供聚落安身的高地有 4处,分别是20 万平方米的谭家岭、6 万平方米的邓家湾、6 万平方米三房湾和 4 万平方米的蓄树岭。城址面积有 120 万平方米之巨,减去 30 万平方米的城墙和总面积 36 万平方米的高地,城内还有约 50 万平方米的低洼农耕地,

近城内面积的一半。

3. 城址内外的聚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社会分工。有迹象显示、石家河城址内部与城 外同一个聚落群团的聚落之间存在明显的社 会功能与手工业的分工。有可能参与了社会 功能分工的聚落是城内的三房湾、因为那里 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祀遗迹。在一处 90 米× 75米的范围内、考古调查曾发现厚 1.75米 的红陶杯堆积,估计数量达数十万件。在城内 西北部邓家湾的 H 67、69 也出土了陶俑数百 件、陶塑数千件。由于附近并未发现窑场,所 以有人认为这两个灰坑应该与祭祀有关[31]。 有可能参与了手工业分工的聚落是罗家柏 岭、肖家屋脊、毛家岭和枯柏树等。罗家柏岭、 肖家屋脊位于城外东南角、均出土过数量甚 多的孔雀石, 而罗家柏岭还出土了锈蚀的铜 制品。估计在这两处比邻的地点进行过铜的 冶炼与铜器制作。毛家岭位于城外东北角、最 近处距城址约500米。枯柏树位于城外东南、 距城址约1公里。这二地都没有正式发掘、但 调查发现毛家岭有大量红陶杯、枯柏树有不 计其数的彩色纺轮, 故推测这两个地点参与 了不同陶器的专门制作[32]。

(二)城址的渊源

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的资料中尚未发现多聚落城址的祖型和渊源,说明这类城址完全可能是距今5千年以后的新产物。出现的原因应该是史前文明化进程日益加速和城址不断强大的结果。

(三)城址的属性

1. 聚落群聚形态的属性。与其他类型的城址一样, 多聚落城址聚落群聚形态的属性也可以分级考察。

第一, 城址本身应该就是一个聚落群。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 天门石家河城址本身就是一个拥有 4 个聚落的聚落群。其中, 谭家岭、邓家湾、三房湾、蓄树岭不仅都是独立的聚落所在地, 而且都有居住类的遗迹。城址中部的谭家岭就发现有屈家岭至石家河 时期的大批平地起建的单间或分间式房屋遗迹,还有考究的土坯砖墙房址^[33]。城址西北部的邓家湾距离谭家岭 500 余米之遥,也发现有房址和留有生活遗物的灰坑^[34]。城址西南部的三房湾以前曾因为出土了大量的红陶杯,被认为是专门的祭祀场所所在地,但在有限的发掘范围内也发现了可供居住的房址^[35],表明整个聚落 6 万平方米的区域并非仅仅用于祭祀。除了以上三地点,城址东南的蓄树岭亦曾发现过大片的红烧土堆积,显示可能曾有人居住^[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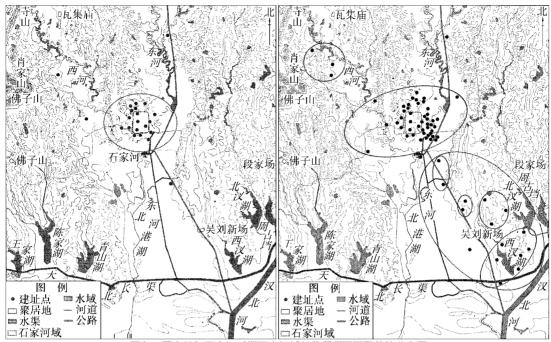
第二,城址都是所在聚落群团的中心。 石家河城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就明显是一个向心结构聚落群团的中心。在距离城址约 1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3个聚落成群环绕在 周围(图九,左)。

第三,城址还可能是所在聚落集团的中心。石家河文化时期,环绕在城址外围的聚落增加到了 38 处(图九,右),是前期的近 3 倍;同时,在前期只有少量聚落的北港湖与北汊湖之间又新发展出一个聚落群团,共有 4 个聚落群 15 个聚落,从而促使当地的聚落群聚整体升级为拥有两个聚落群团的聚落集团,石家河城址也顺势升级成为集团的核心。

2. 社会关系的属性。

第一,城内各聚落居民之间的关系与属性。城内居民共用一个城圈,且如此近距离相聚,因此在史前氏族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类多聚落城址的居民应该同属一个部落。

第二,城址所在聚落群团的属性。根据 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聚落群团一般都应 该属于部落联盟一类的组织。恩格斯曾对美 洲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有过如下论述。"亲 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 成","但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 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 盟"^[37]。考古发现长江中游的史前聚落群团 也曾经历过从"分散状态"到"永久联盟"的 发展阶段。如屈家岭时期湖北江陵阴湘城所



图九 屈家岭与石家河时期石家河城址及周围同期聚落的分布图 (左: 屈家岭时期, 右: 石家河时期, 改自《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在聚落群团就是各聚落群或部落的位置明显分散;而石家河时期的石家河城址所在聚落群团中,各聚落群或部落向心近距离环绕在城址外围,这不仅突出了城址在联盟中的中心地位,也使城址与外围部落之间"永久联盟"的一体化和从属关系更为明显。

第三,城址所在聚落集团的属性。聚落集团完全是史前晚期出现的,以聚落群团为组织核心、其他聚落群或聚落群团近距离相聚而成的一种聚落群聚形态。目前在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两例分属不同类型。以湖南澧县鸡叫城为中心的集团是以聚落群团为核心,其他聚落群环绕在其周边(见图四,右)。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集团是以聚落群团为组织单位,近距离相聚而成(见图九,右)。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聚落集团目前都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它们已是一种地缘化的组织。

第四,关于石家河城址的权力边界。考 古材料表明汉水以东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发 展过程中最激烈的地区。那里发现的城址数 量最多, 共有 7 座, 接近整个地区城址总数的一半。规模还大, 整个地区 4 座 50 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址就有 3 座位于当地。因此, 以城址规模为依据认为石家河就是当地城址群的中心, 即当地或整个长江中游拥有"都、邑、聚"三级结构古国中心者不乏其人。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城址群的中心,还是古国的都、邑、聚,其关键都在于那一片地区是否已经完全地缘一体化,并且都已在石家河城址的管辖范围。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因为考古发现石家河城址的权力边界十分有限。

由于地形的原因,汉水北岸的聚落大都分布在沿江左岸低丘岗地的边缘。在那里,屈家岭时期与石家河城址一同崛起的还有西北方向的京山屈家岭聚落群团以及东部的天门笑城、应城陶家湖等城址。京山屈家岭聚落群团^[38]距离石家河约 20 公里,规模巨大,向心结构,总面积 236 万平方米。中心聚落群以屈家岭为首,内含屈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三聚落,围以环壕,面积 70 万平方

米。环壕外围还有 5 个聚落和 3 个石器采集 点环绕。毫无疑问, 这是目前所见屈家岭时 期石家河城址周边规模最大而又组织有序 的聚落群团。然而, 石家河时期这个群团却 陡然不见了。石家河东部约 25 公里的天门 笑城城址面积达 9.8 万平方米, 发掘可知城 内文化堆积以屈家岭为主, 城墙的修筑年代 也是屈家岭时期。但在石家河时期该城址也 衰落了, 不再筑城, 文化堆积单薄。石家河东 部约 40 公里的应城陶家湖面积 67 万平方 米, 据采集遗物推测该城始筑年代为屈家岭 晚期, 并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时期。

从以上地点的兴亡盛衰不难发现, 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列强并起的时代, 石家河城址及其所在聚落群团的实力与其他聚落群团和城址难分伯仲。但石家河时期, 石家河城址及其所在聚落集团实力强劲, 它向西发展有可能直接导致了屈家岭聚落群团的灭亡, 向东可能造成了笑城的衰落, 并可能催生出了一个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地缘化文明古国。但是, 它对东面的陶家湖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它们有从属关系。这说明石家河城址的势力范围是有限的, 当时在长江中游或汉水中下游也并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古国。

四、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关于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特点、渊源、属性大体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 1. 按城内居民的组织模式将长江中游 史前城址分成单聚落、双聚落和多聚落城址 三种类型, 可以打破以往学界只按规模区分 城址等级的认识模式。各类城址除了类型与 实力不同, 并不见等级差异。
- 2. 单聚落城址出现的时间最早, 规模偏小。双聚落城址出现的时间稍晚, 规模较大。 多聚落城址出现的时间最晚, 规模最大。
- 3. 推动城址逐渐扩大的两个基本内因 是城内居民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内圈

有大量低洼农耕地。

- 4. 单聚落城址的渊源应该是古老的围沟单聚落和环壕单聚落,双聚落城址也应源于古老的各种类型的双聚落遗址,多聚落城址则完全是史前晚期的新产物。
- 5. 单聚落城址内部居民一般都属于普通氏族,而双聚落城址则往往是一对胞族, 多聚落城址则应该属于部落。
- 6. 在以多聚落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团 当中, 可见聚落社会功能与手工业制造方面 的分工, 这种分工显示了聚落或聚落群一体 化程度很高。
- 7. 决定城址聚落群聚形态属性的关键不是城址本身的规模,而是城址本身与城外聚落之间的组织方式。单聚落城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及其以前都是聚落群一级的核心聚落,但石家河时期个别城址却成为了聚落群团、聚落集团的核心,甚至文明古国的都城。双聚落城址既有聚落群一级的核心,又有聚落群团一级的核心。多聚落城址一般都是聚落群团或聚落集团、文明古国的核心。
- 8. 各类城址崛起的历史意义首先是史前血缘社会的重组与整合,这也是长江中游史前晚期社会变革的主流。这一过程的晚期,少数城址——与规模和类型无关——开始引领了聚落社会地缘化的新潮流,最初的文明古国由此产生。

注 释

- [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 [3] 荆州博物馆 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
- [4]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笑城城 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 年第 4 期。

-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 2005 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 年第4期。
- [7]管菁、王娟:《黄陂发现武汉地区最早城址》,《长江日报》2008年11月12日。
-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 新石器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 第12期。
- [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6 期。
- [10]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 出版社、1978年。
- [11] 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与思考》、《农业文化社会——史前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2] 同[4]。
- [13]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 1995 年 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 期。
- [14] 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 年第 4 期。
- [15] 陈树祥等:《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4月4日第1版。
- [16]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 [17] 冈村秀典等:《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I) 1995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 京都第 69 册, 1997年。
- [18] 同[17]。
- [1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 505 页,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等: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2000年第9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旗赵宝沟》 第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22]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第 9 页,文物出版社,1963 年。
- [24] C. A. 托卡列夫等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第196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年。
- [2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5页, 人民出版社, 1974年。
- [26]《民族词典》编辑委员会:《民族词典》第 1015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 [27] 同[19]。
- [28]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第14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
- [29] 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 [30] 石河联合考古队:《石河遗址群 1987 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9 年第 2 期。
- [3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第141~ 144页,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 [32] 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第 370,45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33] 曲英杰:《长江古城址》第 205 页,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 [34] 石家河考古队: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 ——邓家湾》第 1 页、第 17~ 20 页、第 145 页,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 [35] 同[33]。
- [36] 同[32]第450页。
- [37] 同[25]。
- [3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 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 2009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付兵兵)

・60(总 348)・ 考 古



本期要览

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 2009年秋季和2010年春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李家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有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历史。

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 2006年发掘简报 河北省唐县南放水遗址 2006年进行的发掘中发现了夏、西周和东周三个时期的遗存。夏时期遗存的文化特征多元。西周时期遗存的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晚期。东周时期遗存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次发掘为认识西周时期周人与商遗民的关系,解读冀中平原北部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和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丹江口市莲花池墓地战国秦汉墓 2006年至2007年,湖北省丹江口市的莲花池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结合出土器物特征,这些墓葬可初步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这批墓葬是研究丹江地区战国晚期楚文化、秦文化和西汉这三段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学资料。

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分类研究 长江中游现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分为单聚落、双聚落、多聚落三种类型。三类城址的特点、渊源和属性各有不同。城址本身与城外聚落之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城址聚落群聚形态属性。各类城址崛起导致了史前血缘社会的重组与整合。随着少数城址向聚落社会地缘化的方向发展,最初的文明古国由此产生。

南放水遗址夏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初步认识 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受到了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的影响,其主体仍应属先商文化。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体现了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商文化因素则可能与商遗民有关。南放水遗址西周时期遗存或可代表西周燕文化位于大清河及其支流唐河、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